

XIANDANGDAI WENXUEZHONG DE
DANGSHI YANJIU

现当代文学中的党史研究

◎ 常勤毅 著

XIANDANGDAI WENXUEZHONG DE
DANGSHI YANJIU

现当代文学中的党史研究

◎ 常勤毅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当代文学中的党史研究 / 常勤毅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 4
ISBN 978-7-308-09435-1

I. ①现… II. ①常…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
文学研究②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研究③中国共产党
—党史—研究 IV. ①I206.6②D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59820 号

现当代文学中的党史研究

常勤毅 著

责任编辑 陈晓菲

封面设计 刘依群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2.75

字 数 228 千

版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9435-1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88925591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的中共创始人	11
一 《共产党宣言》和《新青年》——点燃星星之火的先驱者	11
二 担起“研究共产主义”责任的瞿秋白	14
三 党成立前夕的“红色出版物”和最早的“党校”	16
四 “共产社会之开幕乐”——“国际歌”声在中国	20
第二章 新文学初创时期的“红色经典”	22
一 中共一大亲历者的红色记忆	22
二 作为诗人和哲人的毛泽东	24
第三章 工农运动与“革命文学”	29
一 “火一点燃,便会有掀天的爆炸”	30
二 1927年:农民的红旗与先烈的鲜血	35
三 “在革命的浪潮里涌现出来”的文艺战士	39
第四章 党领导下的左翼文学与抗日文艺	47
一 党与进步作家之间的重要桥梁	47
二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49
三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55
第五章 延安的政治与延安的文学	64
一 “上帝也征服不了的队伍”	64
二 “可以腾出手来解决文艺问题了”	67

三 “革命文学”的延续与发展·····	72
四 政治家与艺术家的分歧与较量·····	77
五 国统区里的文学与毛泽东诗词中的“将军”·····	85
第六章 新中国阳光下的党与文学 ·····	94
一 跨入“光华耀眼”的“新时代”·····	94
二 “到新中国的阳光下来”·····	96
第七章 党的“双百”方针与文艺“为人民服务” ·····	113
一 文艺界迟来的春天 ·····	113
二 “颂扬诗”:拉开当代文学的大幕·····	125
三 “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 ·····	131
四 追忆“红旗飘飘”的岁月 ·····	139
五 在革命中成长的“青春小说” ·····	146
六 女性的长调 美丽的短歌 ·····	148
第八章 从文艺界反右到全中国“文革” ·····	154
一 1957 年突发的“夏季攻势” ·····	154
二 “文化沙漠”里的十年悲歌 ·····	161
第九章 与中国共产党一同走进新时代的中国文学 ·····	172
一 金色的十月传遍“小道消息” ·····	172
二 迎来文艺“第二春”的第四次文代会 ·····	175
三 成为人民群众推崇的文艺大师 ·····	178
四 精彩纷呈的中国共产党人文学形象 ·····	185
五 “而今迈步从头越” ·····	187
主要参考文献 ·····	194

绪 论

—

虽然有关中共党史学的学科属性与学科归属问题,在学术界一直存在着较大的争议和分歧,但如何加强中国共产党党史的研究和教学从来就是我国各级党政领导、研究人员与相关教师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我们在相关研究和教学实践中,也深深感到如何将中共党史的研究和教学紧密结合当前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特别是怎样与时俱进,以生动形象、形式活泼的面目,走进中国民众的内心深处,真正肩负起对先进文化的传承任务,确确实实是一件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思索的课题。

于是我们开始了对相关问题的调研、考察和探究。

首先,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史不像任何其他的社会科学那样相对独立或者自成体系。比如就以对它的学科归属来说,在目前国内通行的几个主要的学科分类目录上,关于中共党史学的学科归属都是各行其是:在国家技术监督局颁布的“学科分类与代码表”中,将“中国共产党史”划归在历史学大类中的中国近代史、现代史类目下,与中国国民党史、中国民主党派史、中华民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等专门史并列;而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和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编的《学科专业简介》和《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则将“中共党史(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划归在法学门类中的政治学一级学科中,与政治学理论、中外政治制度、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学等二级学科并列。在作为国家图书分类法的《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中,“中共党史”与“中国共产党”(即党的建设)又是分列于历史学科和政治学科之中的,前者置于中国现代史类目中,后者则置于政治、法律类目中。只有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课题指南中,单独列出了“党史·党建学科”,与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政治学、中

国历史等学科并列。^① 一门如此重要的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的历史及其建设的学科,竟然有如此“百家争鸣”的划分,不管怎么讲这都不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

其次,我们分析之所以出现这种划分不同、标准不一的现象,绝对不是因为划分者掉以轻心或不负责任;恰恰相反,正是因为这些分类者将中国共产党党史看得太严肃、太沉重而造成的。我们国家似乎有个传统,向来把和政治关系密切的人与事看得格外严重,无论是一般议论,还是学术研究都是要十二分的小心翼翼。而对与中国最大的政治紧密相关的中国共产党当然就更是慎而又慎。当各方人士都怀着这样一种心态来从事研究和教学时,就难免会出现一些“影响和制约中共党史学科发展和繁荣”的问题。我们认为首要的问题就是:对中共党史的研究与教学的过分“严肃”和“沉重”,使得这门学科的“真实人气指数”(此说法是作者的“生造”,其涵义是指判断人和事是否具有人气,不能只看表面现象。比如某影片的上座率、电视节目的收视率很高,但得到的是骂声一片,就不能说它有人气;大学里某选修课的学生很多,但学生上课不听讲,从事与上课无关的事情,就不能说这门课真正受到学生们的欢迎)并不是像有些人看到的表面现象那样,好像在与日俱增。而其中的主要原因绝对不能讲是人们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漠不关心”,而是我们的研究者和教育者总是“板着面孔”,严肃得让人大气都不敢喘。关于这一点已经引起有关人士的关注。比如早在2008年,中共党史教育办公室主任俞俊生接受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记者采访时就说过:很多青少年不同程度地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存在唱高调、喊口号、搞说教的问题,教育效果不明显。^②

基于以上两点认识,我们在研究和教学实践中发现:中国共产党虽然是个与中国最大的政治密切相关的执政党,但是中国共产党党史却是无数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以鲜血和生命凝成的足以气吞山河的红色经典,是一部“理想与人性齐飞、政治共文学一色”的“历史大片”,就像江泽民在1998年10月给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一封信中明确提出的:“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是一部蕴含和体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

^① 宋俭、丁俊萍:《关于中共党史学学科建设问题的思考》,《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3期。

^② 刘倩:《俞俊生:不说教不灌输 在互动中引导青年学习党史》,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08年07月23日。<http://cpc.people.com.cn/GB/64093/64387/7552588.html>

活生生的教科书。”^①面对着一部如此生动形象的教科书,却不能使其“真实人气指数”高涨,我们的相关学者和教师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二

于是,为了试图担起这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找寻到一个与这部“活生生的教科书”“配套”而又十分重要的“辅助教材”,这就是中国现当代文学。

如前所述,不管学界对中共党史学的学科归属有多少分歧,但很多大专院校包括中小学,都是将中共党史作为政治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现代文学史或当代文学课是大专院校中文专业的必修课(在许多高校里将该课以文学作品欣赏课的面目或延续中小学的做法,作为语文教材的重要章节出现,又成为一门重要的人文素质教育课程和公共基础课)。

经过我们的教学实践和相关研究,我们认为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中共党史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双向渗透,或者说站在中共党史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双重视角上,来审视 1919 年以来的一些重要人物、事件、思潮和作品等,应该是个有益的尝试和探索。

本着这样的思路,从我国当前中共党史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教学现状来看,目前无论是中共党史教学,还是中国现代或当代文学史教学,都表现出一种两者相互孤立、彼此缺乏有机联系的倾向。即便是有研究者零星地涉及一点,也都是从在党史教学中要体现教学艺术、“语言尽量做到通俗易懂,鲜活晓畅”^②的角度,或在现当代文学教学中多关注一点共产党人倡导的文学运动和创作以及描写共产党人形象的作品的角度来实现的。我们认为要想将中共党史教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应该从以下方面加以研究:

第一,要将党史、中国革命史、思想政治教育和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家作品有机结合在一起,以 1919 年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参与的文学运动、创作出优秀作品的中国共产党人和描写歌颂中国共产党人及其先进人物的优秀作品为重要素材,把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产生、发展与中国共产党

① 张启华:重温小平同志对党史工作的指示,《人民日报》2004 年 08 月 13 日,第十四版。

② 董一冰:《关于促进党史教学中“几个结合”的思考》,《党史研究与教学》2008 年第 3 期。

的诞生、壮大进行同步研究;尤其对中国共产党党员队伍发展与建设的历史经验和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历史与规律进行政治的宏观与文学的微观的比较研究与综合考察,这在截至当前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中尚未找到。

第二,将中国现当代作品中的共产党人及其先进人物的形象进行研究,应该横跨 90 多年的时间,也就是上溯到 1919 年,下延到 2011 年,将这一历史阶段中的优秀作品进行多方比较、综合考察,但在当前的研究中只见于个别文章对某一时期、某阶段的研究。

第三,不只是对中国现当代作品中的共产党人及其先进人物的形象进行美学、文学研究;而且还从政治学、社会学角度,对作品中共产党人及其先进人物形象的现实教育作用,从对不同时代的中国人的深刻影响的层面,来研究党史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相互渗透和影响,这不但在理论研究中很少有人涉及,而且在党史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学中也是独创。

第四,将上述研究成果落实在具体的教育教学中,对中共党史、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双向渗透教学的历史与理论依据、教学模式和实践教学进行综合研究,就目前我们所能收集到的资料和信息来看:无论是在当前的中共党史、还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育教学中,都不曾有过。因此我们要为开展这方面的教育教学,提供大量的历史材料和研究成果的评述,为有志开展这方面研究与教学的人,打开更为广阔的思路。

三

加强中共党史、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双向渗透的研究与教学,将对拓宽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视野,提高对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的认识,有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现实意义和学术意义。

(一) 对 90 年来中国共产党发展历程的形象化总结的需要

2011 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90 周年,对 90 年来中国共产党发展历程进行不同角度的研究将是党史研究中的一大景观。而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和中共党史同步发展的角度研究 90 年来中国共产党诞生、成长、发展、迂回和壮大的历程,会使中共党史更具形象性和可读性。如果将这种形象化了的党史运用到高校的党史教学中,对于提高广大教师特别是学生对中共党史的研究、关注,加强学生对学习中共党史的积极性、主动参与性,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和热情等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二）中共党史课程教学在内容、方法和手段等方面创新的需要

教育部副部长李卫红在《中共党史研究》上发表了《认真学习贯彻全国党史工作会议精神 加强和改进学校党史教学研究工作》。她充分肯定了近年来,各级各类学校高度重视党史教学研究工作,取得了良好成效;特别提到在“坚持把党史作为各级各类学校思想政治课的重要内容,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科支撑、核心内容和教学重点”、“坚持把党史列为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相关专业的必修课程,开设党史专业,整合教研力量,加强党史专业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开展富有特色的党史教育活动,引导学生学习党的历史和英雄模范事迹,树立远大理想,立志报效祖国”、“发挥高校学科、专业和人才等优势,加强和改进党史的教育、研究和宣传”,“重视党史队伍建设”等方面为今后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同时,她还明确指出,要把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与学习贯彻全国党史工作会议精神紧密结合起来,更好地发挥学校在党史教育中的主渠道、主阵地作用,并在今后要加强的四个方面工作中,将“加强学校党史教学工作,增强课堂教学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作为第一项内容,特别强调要把党史教育“融入历史、语文等课程之中”,采用“喜闻乐见、生动活泼的方式进行教学,增强教学效果”。^①而党史与现当代文学史相互渗透的教学,则是“增强课堂教学的吸引力和感染力”的有力途径,也为增强思想政治理论类课程的有效性作出实践探索。

（三）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与教学有待彼此渗透、相互作用的需要

李卫红在文章中特别强调要把党史教育“融入历史、语文等课程之中”,这一“融入”观念的提出,启迪我们从事中共党史教学与研究的学者、教师要重视党史与其他学科的交叉与交融;而作为几乎与中国共产党同时诞生、发展、迂回与壮大起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无论在其指导思想、主流思潮、重要作家、优秀作品等方面都与中共党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对它们的彼此渗透和相互作用进行双向研究和同步关系研究的结果,就是为党史与现当代文学史相互渗透的教学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与理论依据。

^① 李卫红:《认真学习贯彻全国党史工作会议精神 加强和改进学校党史教学研究工作》,《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8期。

四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认为加强中共党史、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双向渗透研究与教学,应该尽快落实如下工作:

(一)加强对中共党史、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双向渗透研究与教学依据的探究

按照通常的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的具体年代的说法,一般都认为是以1919年的五四运动为起点。而中国共产党则是诞生于1921年,表面上看两者好像相差2年,其实不少早期共产党人在1921年,甚至在1919年前就开始了相关的革命活动,并发表了大量文章。

比如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早在1918年7月1日,也就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整整3年前,就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尽管不少研究者都认为这篇文章和他后来的《庶民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不可同日而语,但我们认为,在当时能一针见血地指出俄国十月革命与法兰西大革命有着本质的不同,就充分体现出了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远见卓识。纵观后来的苏联革命文学之所以能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以及中国一大批优秀作家产生深远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和李大钊等早期共产党人对俄国十月革命的充分肯定和大力盛赞是有一定的内在联系的。因而我们可以认为:正是像李大钊这样的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从一开始,甚至是建党以前,对俄国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的向往和赞颂,才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源头下,打上了一个深深的“红色烙印”,这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中国具体的文化实践、文学创作及其运动紧密结合,从此使与中国共产党同步诞生、发展、壮大的中国新文学,几乎在每个历史阶段都能紧紧贴近时代的脉搏,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追寻着先进文化的科学发展方向。

我们再以1936年7月出版的《共产国际》上陈潭秋一篇短文《中共第一次大会的回忆》为例。这篇文章一般都是被作为党史研究的重要资料,但可以这样说,所有的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章都把它忽略了。其实当我们今天从文学角度来欣赏时,仍会为作者的文笔而折服。(尽管有的论者认为和译文水平有关,但我仍然坚持认为,出身于书香门第、能在武昌省立一中读书、大学毕业到湖北人民通讯社当记者、曾经做过中学教员、创办过《武汉星期评论》等刊物的作者,完全可以写出有神来之笔的文章。)

说起作为纪实文学之一种的回忆录,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历史里,可以说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文体,无论是作家还是业余作者,无论是将军还是战士,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种回忆往事的文体都有大量的人去写、去发表、去出版;特别是在追溯党的发展历史、回忆党的战斗历程中,回忆录的地位与作用更是不可低估的。然而,我们在不少回忆录中却发现存在着夸大自己功绩、放大历史细节、有意回避对自己不利的事件、将人家之功记在自己的名下、拉大旗作虎皮以及写法上的华而不实、报喜不报忧等不良现象。

但是当我们读完陈潭秋这篇回忆文章后,我们为他在低调、谦逊中所展现出来的大公无私的集体主义美德所感动——文章从头至尾只在介绍参加会议的代表中淡淡地提了一句“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董必武和我”之外,没有再提及自己一句,全文的人称用的更多的是“我们”、“大家”。这一点我们在陈潭秋的夫人王韵雪的回忆中可以找到足够的证明。当《辽沈晚报》的记者问起陈潭秋是否曾经与王韵雪谈起过中共“一大”时的情景时,这位老人说道:“那是在1941年建党20周年,新疆八路军办事处20来人开座谈会纪念党的生日,陈潭秋讲起了中共‘一大’,代表们先在上海开会,听说有人来包围,又移到嘉兴一条船上,才把会开完。”王老说:“我大致记住讲了这些,但当时讲‘一大’时,他从来没讲到自己,当时大家也都不知道他就是陈潭秋。”^①当我们称颂陈潭秋的高尚人格之时,我们也为他在朴实无华的文笔下蕴含的生动、娓娓道来时潜在的激情、平铺直叙中暗藏的悬念、安静清淡里埋伏的曲折……所有这一切而深深地折服!就冲着这些,我们中国现代文学历史里就应该有陈潭秋一笔,浓墨重彩的一笔!

还有毛泽东的早期作品,比如发表于1919年的《湘江评论》创刊宣言,其思想性、艺术性都堪称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佳作:^②

……至于湘江,乃地球上东半球东方的一条江。它的水很清,它的流很长。住在这江上和它邻近的民众,浑浑噩噩,世界上的事情,很少懂得。……咳!湘江,湘江!你真枉存于地球上。

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的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以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它的生,逆它的死。

① 本报特别报道组:《他谈起“一大”时从没讲自己——王韵雪追忆丈夫陈潭秋》,《辽沈晚报》2001年6月21日。

② 毛泽东:《〈湘江评论〉创刊宣言》,载《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如何承受它？如何传播它？如何研究它？如何施行它？这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不知从何时开始，许多伟人写的很有文采的一些东西，被众多的现代文学史研究者与专家们所忽视，我们不妨做一大胆的设想，假如同样是谈法俄革命的议论文、同样是回忆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文章、同样是发表在《湘江评论》上的创刊宣言，假如不是出自李大钊、陈潭秋和毛泽东之手，而是现代文学史上哪个作家之手，肯定会引起文学史家们的高度关注，说不定这位作家会因此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座次排在前面。然而当我们翻阅了几乎所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后，却令我们大失所望或疑惑丛生：是谁规定的伟人、领袖写的好作品就非得载入党史、而不能写进文学史？

有关中共党史、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双向渗透教学的依据俯拾即是，可以说中国共产党 90 年的历史，也就是中国现当代文学诞生、发展、壮大的历史，中共党史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有着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将这些联系研究并挖掘出来，并且落实在教学工作中，是贯彻好全国党史工作会议精神的最好体现。

（二）加强对中共党史、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双向渗透的教学体系研究

教育创新，已经提了很多年了，但每每到了具体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课程中，就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阻力。比如我们在此提出的中共党史、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双向渗透的教学，就很有可能被有些人质疑：“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文学史或中国当代文学完全是不同的课程体系，把这二者捏合在一起，有些不伦不类。”其实世界上很多创新和改革在初期都会被认为是“不伦不类”、“别出心裁”，但就是这种大胆尝试才给创新带来有益的启迪；假如成功了，就是一种新突破；即便失败了，也为后人提供总结经验的教训。

前面讲过，中共党史是从 1921 年开始，中国现代文学史是诞生于 1919 年，在历史长河中，2 年之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关键是中共党史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在许多时候和许多方面都是体现出一种密切的关联和同步性。通过研究将这些关联和同步性寻找出来，然后落实到中共党史、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双向渗透的教学体系之中。

有关这一教学体系的建立，首先要完成的工作是聘请取得中共党史、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双向渗透关系研究成果或对该领域有研究意愿的专家、教师共同编写一套教材。这套教材在试用阶段可以先在选修课或考查课上使用，立足点可以根据侧重点的不同来确立。（笔者在 2011 年上半年已开始了此方面

的教学实践,通过图文并茂、声像交融、讲述与讨论、创作与表演为一体的形式进行了党史课的创新,结果受到广大学生的欢迎。)

比如,如果偏重于编写一套更形象生动、具有较强可读性和感染力的中共党史教材,则可以中共党史的发展脉络为主线,然后按照这一主线,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选取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有关的作品(以纪实文学为主),对中共党史进行形象化的阐释。如果偏重于编写一套在中共党史视域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教材,则以90年来中国共产党诞生、发展、迂回和壮大的演化轨迹为时间线索,以1919年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学运动和描写、歌颂中国共产党人及其先进人物的优秀作品(可以是诗歌、散文、小说、歌曲、影视作品甚至美术作品)为重要素材,将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和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家的作品有机结合在一起,把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产生、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壮大的同步性通过教材展现出来。

其次,以学生愿意并且熟练掌握所学的知识为出发点,以学生在对中共党史、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双向渗透的教学中提高思想政治修养和文学素质为目的,建立一套以在课堂上运用各种教学手段传授党史和文学史知识为主、在课外带领学生做好相关学习实践为辅的教学体系,坚持学以致用、学以致用的教学原则,开发第二课堂的潜力。笔者作为教师在教学中经常会为学生中共党史知识的贫乏而深深担忧,说到底不是我们学生对党的热爱程度降低,而是死记硬背的党史教学让他们乏味。如果想要调动学生学习党史的积极性、主动性、参与性,实践教学环节不但要加强,而且切切不可走过场。

比如在讲到“自由”这一命题时,我们可以将学生带到曾经关过革命者的类似重庆“白公馆”、“渣滓洞”这样的地方,亲自感受和了解共产党人为争取人们的自由而舍弃了自己的“自由”;也可带学生到关过张学良的蒋介石的老家——雪窦寺参观,听听讲解员讲述当年张学良眼前有美景,身边有“美人”(赵四小姐),只因没有自由而倍感苦恼的往事;再联系革命志士写的诗歌:“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吧,给你自由!/我渴望自由,/但我深深地知道——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里爬出!……”,“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甚至可以提起匈牙利革命诗人裴多菲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诗句,这样一来,我们就自然而然地将党史教学和文学史教学有机结合在一起;学生们既

学会了做人,也学会了“做文”。^①

试想这样的中共党史教学能不受到学生们的欢迎吗?

在笔者的教学和辅导学生的工作中常常发现这样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就是党史教学和学生的入党教育经常体现出一种双向脱节的现象。教师讲党史是为了完成教学任务、学生学党史是为了完成“学分”,很少能与提升学生对党的认识、对学生进行入党教育挂钩;而在学生的入党教育中,由于一般都是由管理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非教学人员来主抓,因而他们开展的入党教育又不是以党史教学为主,这样一来急需将党史教学和学生的入党教育二者结合起来的课题就摆在了我们面前。

因此,从理论意义上看,该项对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关系的进行较为系统并力求真实的历史考察和对其基本经验和教训进行较为全面和公正的研究,对重新审视和正确理解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关系,提高对中国共产党90年来为建设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先进文化而作出的不懈努力的认识,充分重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和广大共产党员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和历史作用,实事求是地总结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中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与教训,为中国共产党今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方面提供其基本经验和研究其历史规律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而在应用价值和实践意义上讲,将政治的宏观与文学的微观相结合,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前提下,以尊重历史、实事求是为根本原则,力争将文学史的教学与党史、中国革命史知识的传授和思想政治工作这三者完美统一,给从事这三方面教学、研究和工作的人提供一种全新的视角和资料素材就显得尤为重要。同时它还能给党与政府的有关部门在开展党建、思政工作时提供一种“思想库”,力争将中共党史、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双向渗透的教学与形象化的党员教育课程结合起来,一方面汲取历史经验和教训,一方面为现阶段党的建设提供重要参考,进而推动党建理论创新。

^① 常勤毅:《生活美学价值新论——中西文化比照下的人性与时尚》,光明日报出版社2008年版。

第一章 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的中共创始人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指导思想,也是后来一直作为中国新文化中“红色灵魂”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当时神州大地上,已经开始点燃了星星之火。

一 《共产党宣言》和《新青年》——点燃星星之火的先驱者

早在19世纪的最后一年,中文报刊上第一次出现了马克思的名字,这就是1899年2月上海广学会出版的122号《万国公报》。上面刊登了由李提摩太译、中国教士蔡尔康撰写的《大同学》,其中便提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而且还涉及《共产党宣言》的有关内容。

1903年3月,广智书局出版了福井准造著、赵必振译的《近世社会主义》,这是第一部较为系统地介绍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著作。书中第一次使用了“共产主义”一词。该书分为上下册,详细阐述了马克思的学说,盛赞他“为社会主义定立确固不拔之学说,为一代之伟人”;该书的作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以深远之学理,精密而研究之,以讲究经济上之原则,而认信真理与正理,故以多数之劳民,容易实行其社会主义”。^①

1905年底,资产阶级革命派朱执信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第二号上发表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一文,记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平和学说,并第一次简要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写作背景、基本思想和历史意义,还依据《共产党宣言》的日文本并参照英文本摘译了该书的几段文字和第二章的十大纲领全文,并作了解释。作者当时将该书的书名译为《共产主义宣言》。颂扬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学者宝贵之”,马克思起草的《共产党宣言》是世界无产阶

^① 李景治:《国际共运史学百年》,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9—22、166—168页。

级的“金科玉律”，“而其学理上之论议尤为世所崇者”是《资本论》。^①

1908年3月15日，刘师培（署名申叔）在《天义报》发表了《〈共产党宣言〉序》。这是中国人第一次为《宣言》作序。此后，有关《宣言》的文章不断见诸报端。据不完全统计，他们在《建设》、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上海《星期评论》上发表了马克思主义原著及相关文章100余篇。

这种情况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已经开始由星星之火发展成燎原之势。在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中，涌现出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翻译家，如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李达、陈望道等。他们从一开始就十分注重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译介和传播。比如李达翻译的《唯物史观解说》、《社会问题总览》和《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等著作，李汉俊翻译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和恽代英翻译的《阶级斗争》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全译本。

早在1920年3月，李大钊倡导成立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即马克思——引者注）学研究会”就集体翻译了德文版《共产党宣言》的全文，印发了少量油印本在当时的先进分子中传阅。1920年8月，由陈望道根据日文和英文版本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译本在共产国际的资助下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正式出版。东营市历史博物馆保存了一本陈望道翻译的第一版《共产党宣言》，其中“产”和“党”两个字印反了，现为国家一级文物。陈望道译本在以后的20年中，多次重印，广为流传。毛泽东在1920年第一次阅读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周恩来对陈望道就说过：“我们都是你教育出来的。”^②

《共产党宣言》对当时在国外勤工俭学的青年学生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20年初，蔡和森在法国先后翻译出《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著作的重要段落，在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中广为流传。邓小平也是在法国勤工俭学时读到《共产党宣言》并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他后来说，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③

如果说《共产党宣言》是对中国共产党人影响最深远的一本外国人写的书，那么，《新青年》则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和早期共产党人创办的一份重要

^① 田子渝、李资源等：《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中国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166—168页。

^② 晓雪：《陈望道与〈共产党宣言〉》，《复旦》校刊2006年5月31日。

^③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页。